第一章　意义、方法论和理论前提

一、国家控制能力问题研究的理论意义

始于70、80年代的中俄体制转型，在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印迹。这两个大国社会的变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两国体制转型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其中虽然有相似的地方，但更多的是表现出差异性。从国家能力和国家控制能力角度研究两国体制转型，是探讨体制转型规律，判明其得失的重要切入点。

国家能力和国家控制能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纪之交的主题，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各国的关注，并成为政治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关于国家能力和国家控制能力的基本概念（将在本书第二章中展开分析），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前者主要是指国家怎样通过自己的有效干预以保持国家的持续发展，而后者主要是指中俄等原来实行计划经济、集权体制的国家，在向市场经济和分权体制转型过程中，如何保证国家的有效控制问题。研究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转型过程中保持其有效的控制能力，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

国家如何保持有效地干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能力，是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从亚当·斯密开始，就市场和国家的作用，人们已经争论了几百年（这种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不论人们的认识如何，国家的作用始终是一个客观存在。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个问题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本世纪 30 年代以前，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信奉自由竞争、自动调解、自由放任，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经济原则。30 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兴起，提出“国家调解经济”的思想：“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限定利息率，以及其他方法，指导消费倾向。……把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来综揽”。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体制中的宏观调控的形成和发展实际是渊源于凯恩斯经济思想。虽然 70—80 年代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兴起，凯恩斯主义遇到严重挑战，其时自由放任派和政府干预派展开了激烈争斗。但是不管怎样，迄今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市场经济并未完全排除政 府干预和管制。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西方各个发达国家所实施的，只是程度不同、方式不一、侧重点各异而已，因而表现出不同类型市场经济体制。这主要是人们公认市场是有局限性的：

第一，市场的垄断化倾向阻碍市场机制发挥正常功能。市场经济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从而提高企业效率。但是，微观经济学告诉我们，只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下，资源配置才是最有效率的。在现实世界中，市场竞争导致优胜劣汰，继续淘汰以后，企业的家数减少，各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增加，企业家数减少到一定程度后，他们从价格的接受者，转变为一定程度的价格控制者，家数越少，控制价格的能力越大。竞争走向其反面，市场垄断性增加。而垄断性增加，生产效率则下降。

第二，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所导致的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是极不合理的。市场交易在原则上是平等的和等价的，但由于人们的资源禀赋不同，所处的客观环境不同，收入水平就会有差别。而且实际上由于市场价格随着供求的波动而上升或下降，市场的自发调节容易引起收入差距扩大，从而偏离社会的公正原

则，引发社会矛盾。

第三，市场经济导致国家短期行为而忽视国家长远利益。具体说来，市场与社会化界限：企业关心的是短期的经济变动，他们对长期的经济发展不感兴趣。因此，凡投资大、利润少和风险大的长期发展项目就必须由国家来承担或组织；市场的生态学界限：人类的生产活动必须与土壤、植物区系、动物区系、大气等保持平衡，这种平衡必须受到国家的监督和保护，在这方面必须坚持生态原则高于市场原则；市场与公共产品如国防、警察、消防、保健、防洪工程等，不一定有利可图，但它有益于整个社会，国家要参与保护。

所以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 纯粹的 ” 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市场经济都是 “ 混合的 ”，因为在任何现代社会里，政府都起着重要作用。政府必须保证一种适当的制度框架继续存在。此外，政府必须保证法律和秩序、合适的军事防卫和福利制度。

具体说来，政府的经济职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提高社会效率。政府通过保持经济总量平衡、币值稳定，保持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同时通过制定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引导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以支持宏观经济的增长和稳定。 2. 促进社会公平。政府通过经济立法和执法来规范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限制各种不正当的经济行为，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并制定收入政策，调节收入分配， 通过征收累进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税措施，抑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过分膨胀；通过直接的转移支付及对商品和劳务的再分配政策，增加贫困阶层的收入，促进公正的收入分配。 3. 提供公共服务。这包括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对内主要包括从事道路、公共文化设施、公共卫

生、学校等方面的建设，保障国内治安，形成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对外主要是，维护领土完整与国家主权，从事外交活动，努力维持一个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

可以说，今天各国政府对经济各个领域甚至个人生活的影响程度，比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甚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都有一个巨大的、不可同日而语的变化。我们通过政府公共开支不断扩大这一个案，论证这个问题。

一百多年前德国的瓦格纳在对几个国家的公共支出情况作了考察之后提出的“瓦格纳定理”就曾预言：进入工业化以后，经济中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比例上仍将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公共支出将不断膨胀，这一规律在 50—100 年以后仍将发生作用。后来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都验证了瓦格纳定理。萨缪尔逊对战后美国公共部门膨胀的历史经过研究之后预言道，在将来的岁月里，不管哪一个政党执政，政府支出上升的趋向多半会继续下去，并将至少占 GNP 的 25%。美国著名财政学专家马斯格雷夫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英、美、德三国的公共支出结构的变化作了考察，其结果总的来说，西方公共部门发展的趋势与瓦格纳的预测是相吻合的：公共支出占 GNP 的比率，英国从 1890 年的 8．9%上升到 1995 年的 36．6%；美国从 1890 年的 7．1%上升到 1962 年的 44．1%。后来，马斯格雷夫于 1984 年又对几个国家公共支出的规模作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 6 个西方国家中，美国 1980 年度公共支出占 GDP 比率最小，为 36%，瑞典最高，竟达 61．5%。比较经济学家普莱尔将战后东西方社会福利开支作了比较，发现不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福利开支呈现出膨胀的趋势，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支出也同样在遵循着这个规律，

所不同的是它的增长速度稍低于西方国家。① 如何解释 100 多年来世界经济史中持续出现的瓦格纳现象？我们虽然可以从凯恩斯主义那里找到一系列现成的答案，但就目前状况来看，第一，随着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世界资源紧张，竞争激烈，国家用于国际交往、军费等方面的开支增加；第二，从国家内部条件来看，公共产品需求不断增加。恩格尔定律告诉我们：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等“生理需要”的开支比例越来越小，、而用于非生活必需品等“精神需要”的开支比例将越来越大。“精神需要”，主要包括医疗保健、文体设施、交通运输、社会保险、公共安全等，这些由于市场本身的局限性，需要政府投资。

公共产品更新换代的社会需求的不断提高，成了推动公共支出不断膨胀的原始动力。这就要求国家要有很强的能力来保持公共支出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二、国家控制能力问题研究的实践意义

必须承认，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的集权和计划体制对经济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中俄（苏）两国转型前，国民经济有了一定的基础，具体情况见下表：②

① （美）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 页。

② 钢产量和石油产量数字见：Ю. В. пискулов：《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тмоговля》, Москва, 1998.C.56. 其他数字见〔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下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366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1988年美元计算）	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1965—1988年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	钢产量（百万吨）1985年	石油产量（百万吨）1985年	成年人的文盲率（%）
苏联式经济						
苏联	2660	4.0	70	89	542	<5
中国	330	5.4	70	47	125	31
匈牙利	2460	5.1	71			<5
市场经济						
美国	19840	1.6	76	81	441	<6
印度	340	1.8	58			57
意大利	13330	3.0	77	24	2.4	<5
埃及	660	3.6	63			56
瑞典	19300	1.8	77			<5

诚然，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整体生活水平不如实行了多年市场经济的国家，关于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显示的数字不一定准确，但这其中还是反映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特别是有了一定规模的基础设施；二是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大国要有相当规模的公共支出。这要求大国更要有较强的控制能力，保持相当规模的公共开支。固然，有些小国的公共支出比率也是很高的，前面提到瑞典1980年公共支出比率高达61.5%。但这里很多是社会福利开支，或者叫软性开支，就是既可支出，也可不支出，实际上从90年代以后，瑞典开始大规模削减福利开支。而大国的公共开支，多数是维持基本运行条件的硬性开支，比如基本设施的维护、救济灾民、基本建设，则由于国家广大，这些费用都是很高

的。俄联邦 1994 年财政支出预算定数：194495．3 十亿卢布，支出前几项的开支为：民族方面： 40626．0 十亿卢布；工业和基本建设：30721．2 十亿卢布；国际活动： 18078．6 十亿卢布；国家义务服务：15312．2 十亿卢布[①]，仅这几项就占总支出的一半左右。中国这方面的费用则更高。充分发挥原有基础设施的经济条件的作用，保持公共开支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是体制转型能否成功的基本条件。这种转型的特定背景，要求在体制转型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市场经济固有的局限性，以及国家原来所具有的优势，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保证国家对转型过程的有效控制。

本书将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下列主题：从保持和发展国家控制能力的角度分析，中俄两个大国体制转型“渐进优于激进”。但由于两个大国国情复杂，对“渐进优于激进”不能简单化，特别是在当前的形势下渐进转型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以把中国的体制转型不断推向深入。

三、国家控制能力问题研究的方法论

本书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其理论依据在于：

第一，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结合。所谓统一性，主要是指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性。尽管各个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地理位置、政治体制等方面仍存在很大差异，但仍然有共同的基本的社会经济形态方面的特征。另一方面，各国具体的历史发展又具有多样性，百姿千态，丰富多彩。历史发展的这种共同性与差异性，构成了历史比较研究切实可行的科学依据。

① М．К．Бункина《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ло” Москва，1997.С.190.

第二，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各国进入同一社会形态有早有晚，发展程度有充分不充分之别。纵观世界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先进变落后，落后变先进，你追我赶，后来者居上，一幅曲折前进的画面。先进入某一社会形态的国家，为行将进入者预示发展的大致方向，而后进入者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又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世界历史的不平衡性，也成为历史比较研究可以进行的实际前提。

第三，历史如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都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在历史演变进程中，大至社会形态，小至具体的某人某事，均处在互相联系之中。历史上的各种事物，不仅在时间上以先后之序相互联系着，而且还在空间上以对周围事物的依赖性相互联系着。历史无论从纵的发展还是从横的断面看，都是又有联系又有区别，均可作比较。“相比较而存在”，是客观的实际。

比较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著名比较史学专家马克·布洛克指出：历史除非能在“确立现象之间关系的解释方面取得成功”①，否则就无法理解。他还指出，通过比较才能发现不同社会的独特性②。但还要看到，比较研究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从比较的前提上分析，只有是“共同规律起作用的事物”，渊源上相联系的事物，“相互有影响的事物”才能进行比较。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比较前提的重要：“倍尔西阿尼所以是一位无比的歌唱家，正是因为她是一位歌唱家而且人们把她同其他歌唱家相比较；人们根据他们的耳朵的正常组织和音乐修养作了评比，

① 转引自范达人著：《当代比较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7 页

同上，第 130 页。

所以他们能够认识倍尔西阿尼的无比性。倍尔西阿尼的歌唱不能与青蛙的鸣叫相比，虽然在这里也可以有比较，但只是人与一般青蛙之间的比较，…… 只有在某一种情况下才谈得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比较，在第二种情况下，只是他们的种特性或类特性的比较。”[①] 从比较的过程上分析，比较的事物应该是具体的。事物之间的异同，有现象的，也有本质的，科学的比较不要限于单纯地罗列一些表面的同异现象，而是要透过现象，分析原因。这就要求把比较的事物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这是关系到在历史比较研究中是否坚持唯物主义原则的问题。同时，还要注重比较事物的具体环境的研究。比较研究固然是将事物中最主要的比较点找出来研究，“但因各人观察点不同，其所注重之要素不同”，“何为重要比较点，尚无定论。比较之后的优劣，也无定论。”[②] 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注重具体环境的研究。

本书将比较研究的主题严格控制在“国家控制能力”范围内。中俄（苏）原来都是社会主义的大国，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国家控制能力发生了变化。通过对国家控制能力这一具体事物进行比较，从一个侧面探讨大国体制转型的一般规律。在比较过程中注重以下几点：第一，注重对中俄国情特点的分析，这是比较研究和价值判断的前提。第二，注重运用具体材料进行比较，即选用大量官方公布的材料和社会调查材料，并采用大量统计资料进行定量分析，以使比较研究更加具体。第三，注重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在对客观现实进行描述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的理论框架分析客观现象背后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之上，借鉴西方政治学、历史学的方法。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布罗代尔的“三时段”说，即：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长时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518 页。

② 沈乃正：《比较政治制度》，中华书局 1934 年版，第 215 页。

指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慢的、在历史上起经常、深刻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中时段，指在 20至 150 年之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性的一些突发性的事件，如革命、自然灾害等。布罗代尔认为，短时期内的‘事件’只是‘闪光的尘埃’，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仅起微小作用。这种“三时段”说，同生态政治学、生态行政学的观点有相似之处，都非常重视社会环境的作用，对我们研究当前中俄社会转型有启发意义。

四、国家控制能力比较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客观基础

中国和俄罗斯社会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有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行性，两国都曾经历过惊心动魄的社会跳跃，从落后国家进入到社会主义；两国都具有东方社会的特点：中国是典型的东方国家，俄罗斯是具有东方性质的社会，同西方社会有本质的区别；两国从国土、人口等方面衡量，都是规模很大的国家，不同于大多数中小国家；两国都是工业化起步较晚的相对落后的国家，不同于英美法等早期工业化国家；两国在自然资源的总量上都有一定的优势，不同于日本等国；两国都是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问题成为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不同于瑞典等单一民族的国家。这些问题都要研究，以找出对体制转型过程中国家控制能力产生影响的多层面的因素。

中国的社会转型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而前苏联的改革，则走向反面导致苏联解体。如果把转型方式和社会性质联系起来分析，俄国的激进转型方式是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的渐进转型方面则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通过对两种转型方式的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更深刻地理解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社会性质问题是研究体制转型的重要内容，但本书不拟更多地直接涉及这个问题，因为一是这个问题已

经很清楚，二是任何社会都有一个转型问题，转型的内容不通过社会性质的分析是完全可以说清楚的，因为市场经济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邓小平讲过：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至于集权和分权，就更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但也不可否认，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共产党领导；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利用政治优势加强国家宏观调控，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而渐进转型方式正是坚持了上述原则。通过对两种转型方式的分析，对上述问题的理解会更深刻。此外，有些问题一定要涉及到同社会性质相联系的意识形态等，比如分析国民政治文化的整合能力就涉及到主体意识形态同爱国主义的关系。本书对这些问题将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回避社会性质和主体意识形态等问题时，就不回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章　体制、转型理论、国家控制能力

一、体制、体制转型理论、国家控制能力

(一)体制

所谓体制，是为了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而设定的制度规则。体制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理解。体制的微观理解更具有操作性，主要是指各种机构职权划分的原则和具体划分的状况，是实现国家能力的操作保障。通常讲的体制科学化，主要指权力体系系统中科学地划分权责，机构编制的法制化和实际运行的高效率。体制的宏观理解是和对制度的理解相联系的。体制就是系统，是一定社会得以运作的制度化结构，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理论中，体制和制度一般是不分的。他们理解的制度、体制和制度、体制理论的一般含义主要有：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①。美国制度创新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思指出：“我研究的重点放在制度理论上，这一理论的基石是：1. 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2. 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3. 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这种理论解释为何人们对现实有不同的理解。”② 其他的定义还有：“制度是一个社会中一些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还有人把制度定义为通过传统、习惯或法律约束的作用力来创造出持久的、规范化行为类型的社

① （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87 页。

② （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 页。

会组织[①]。

如果从中俄两个大国的体制转型和国家控制能力角度来理解体制，有三点是不可忽视的：

第一，体制总是社会性的。说某种体制是什么性质的，归根到底只有在不同体制区分的理论表述上才有意义，或者说，是意识形态的需要。本世纪初，世界上出现了以国家为实体形式的两种社会体制的对峙，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改革开放 20 年后的今天，这种对峙区分的意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让位于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排位竞争。这种排位当然不是一种荣誉，而是实力差距，是全球化中的优势。关税、区域经济合作、军事同盟、反倾销政策、国际制裁、世界经贸组织、最惠国待遇、高科技垄断甚至经济援助和文化教育培训，都被用来作为增强本国在全球化中的优势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体制的结构如何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制约着功能的发挥和运用，而体制改革和调整也的确成了世界各国都在进行的工作。中国和俄罗斯的体制改革尤其有着特殊的含义。在全球化的优势竞争方面，两国当然都是后来者，而领先的发达国家的社会体制都是资本主义的。这并不是说，中国和俄罗斯的体制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的路，更不是说，社会主义体制比资本主义体制缺乏活力。事实上，这里要解决的并不是这两个主义谁优谁劣的问题，目前的问题只在于，被称做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已经在资源配置和规则制定方面占了优势，中国和俄罗斯所面临的问题，是有一个能够尽可能充分发挥经济和社会发展功能的体制结构，以便在争取排序优势方面赢得时间和实力。

第二，体制既包括有形规则，也包括无形规则。首先要明确

① 参见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6 页。

的是，无论是法律、规章还是习惯、道德，都是制度，因为就其基本功能来说，都是调节人际关系的一种规则，都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某种约束。早期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家们更强调制度作为一种习惯的特征，认为制度的本质就是长期形成的习惯或传统。诚然，现代的制度经济学则更强调制度是一种规则，一种各利益集团之间经过斗争而形成的社会契约。但不能因此就忽略无形规则的作用：一方面，许多正式的制度，本身就是根据习惯、传统等制定的，这些正式制度形成后，在运行过程中还要受无形规则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俄罗斯，缺少法制传统，更重视非正式规则的作用。因此，在社会转型和国家控制方面，无形规则成为调节和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

第三，体制只有和国情背景联系起来才有实际意义。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国情特殊的大国。现在又面临着全球化的竞争压力，世界排序靠前的发达国家是经其在资源配置和规则制定方面的优势来推行全球化战略的，并使其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这使一些弱国很容易走人“接轨”，即走上与发达国家“接轨”的岐途，而忽视国情因素。实际上，由于国情因素的影响，“接轨”并不是跟着发达国家已经给出的模式和规则走，而是创造发展自己的有效模式，参与制定全球化运作的规则。

(二)体制转型理论

200 多年以来的以亚当·斯密的思想为核心的主流经济理论一直在努力说明，市场组织是最有效的实现资源配置以满足经济个体对物质文明需求的制度，政府的作用是“守夜”和制定规则。于是，认为最有效的制度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导致的大萧条以事实表明这一判断并不全面。自由竞争导致的萧条被凯恩斯总结为是因需求不足造成的，总供给的不断增加和有效需求的周期性不足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这是市场自身的缺陷，因而只有由政府来对此负

责，但只需制定一套合理的宏观经济制度并实行逆“风向”而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政府通过间接调控而不是直接干预就能维持经济的稳定。于是，正如新古典综合派认为的那样，最有效的经济制度是政府通过宏观措施实行间接调控（而不是直接干预）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传统主流经济理论总是认为，政府直接干预和市场自由原则是不相容的。市场要能有效地实现资源配置，价格必须是自由形成的，若政府直接分配资源或对交易实行某些管制，就会扭曲价格，破坏经济均衡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缺乏效率。

此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两种手段交替使用，从而相对减少了单一干预方式的负面影响，有效地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无论是“国家干预”，还是“自由放任”，其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没有改变。

但为什么相当多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和俄国这样的大国一开始并没有形成市场经济体制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比较权威的解释是现代化的理论。即认为世界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中俄都是后现代化国家，为了同发达国家竞争，都要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启动工业化，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体制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依靠国家来启动工业化，赶超发达国家这个单一的目标压制了一切，没有时间，也不允许创造市场经济的必备的条件，如：交易秩序的建立和维持，产权的法律保护，必要的资本积累，由此形成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以层级组织来实现资源配置的中央计划型经济体制，对于需求稳定、目标单一的社会生产就具有较高的效率。通过建立一个金字塔式的层级组织，可以由计划和指令来配置资源和分配产品，以解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这种制度形成的成本主要是对层级组织的管理成本和收集处理各种需求和生产的信息的成本。当个体之间的需求差别不大，整个

社会目标较一致，中央计划者只需收集和处理一定数量的信息，就能确定对每种产品的需求量和成本，从而在安排资源予以生产时，这种制度结构就具有较高的效率。如战争期间，全社会的基本目标较为一致：满足个体的最低生活需求（这时个体间的需求差别不大）和尽可能多地提供军需物资，计划式的统制经济就具有较高的效率，只要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就能保证经济生活的运行。但当个体间的需求差别较大时，中央计划者为了解各个个体的需求状况和每种产品的生产成本需要收集和处理大量信息的成本急剧上升。当人们之间需求的差别大到一定程度时，或者说社会对产品需求的种类增加到一定数量并且不断变化时，中央计划者用层级组织的产品种类是有限的。或者说，当某一社会选择某种层级组织作为物质产品的生产制度时，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只能生活在与较低水平的消费模式基本相同的落后经济形态中。而当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信息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时，传统的集权的计划体制更显得笨拙，反应迟钝。社会转型就更显得十分必要。

制度的运行需要一定的条件，意味着制度的建设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具有很大程度的资产专用性，因而进入或退出一种制度都需要付出资源，所以存在制度变迁的效率，因此制度变迁是一个过程。长期内，市场制度是有效率的，问题是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将生产组织方式从统制制度调整到市场制度？对于落后国家来说，最为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寻找从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最佳途径。

传统经济学理论证明了市场制度的有效性和中央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但没有说明从一种经济制度到另一种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中，资源应如何配置才是有效的。从统制或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过程中应采用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因为政府全面的直接的干预是无效率的，要放弃中央计划；另一方面，市场的

自动的资源配置功能是有效的，但还未完全建立。一种可能的选择是突变式的及政府不干预的，政府一次性地全面地放弃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让市场（及部分相关的制度）在新的环境下自动生成，但要承受初期的商品价格和交易秩序混乱的代价，并且很难保证这一过程的时间和新的市场制度的有效性。另一种可能的选择是渐进式的并且政府在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培育和建立新制度的同时促进经济的增长。历史提供的可供比较的案例不多，体制转型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关于体制转型理论，是同发展经济学、政治发展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紧密相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新独立的国家。它们都对本国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进行大规模的调整，但也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许多问题。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和现代化的问题，特别是如何从农业——工业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产业结构转换的问题。政治发展理论则是研究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领域的变化。而制度经济学则主要研究体制和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入 7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这些国家虽然有的已经解决了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问题，如前苏联，但又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体制转换问题。在体制转换过程中，除了存在着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共同的问题，即集权体制向分权体制转变外，还有一个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问题。过渡经济学（Economics of Transition）主要就是研究这些国家体制转轨问题，其中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MckinnonK.C），代表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荷兰经济学家米切尔·爱尔曼，代表作《社会主义计划的根本问题》，法国经济学家玛丽·莱温，代表作《过渡经济学》。以研究集权向分权、计划向市场体制转换为内容的，就是体制转型理论。体制转型理论涉及以下内容：经济体制转型与政治体制转型的关系；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